

那些年,不只有青蒿素(上)

——上海地区“五二三”抗疟研究回眸

◆ 杨震

“内忧外患”的疟疾

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,系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,它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虫媒传染病。上世纪20年代起,我国老一辈寄生虫学家对云南、广西、贵州、广东、台湾、江西、四川、浙江、河北等21个有疟疾流行的代表地区进行调查,发现人体全部四种疟原虫——间日疟原虫、恶性疟原虫、三日疟原虫、卵形疟原虫——在我国均有存在。据统计,在解放前,中国每年的疟疾病例达到数千万,死亡率也非常高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我国的疟疾防治工作前后经历四个时期。1950年代属于第一阶段:重点调查及降低发病率阶段;1960年代和1970年代属于第二阶段:控制流行阶段;1980年代和1990年代属于第三阶段:消除疟疾阶段;2000年之后进入了第四个阶段: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阶段。“五二三任务”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即第二个阶段之中。

“五二三任务”是如何诞生的呢?1960年代初期,越南战争升级,疟疾成为交战各方参战部队的主要传染病。据说当时南越部队及美军第一师发病高达100%,而且由于疟疾抗药性的问题,很多传统抗疟药疗效很差,疟疾已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。1967年5月23日,解放军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委、军委总部直属和有关省、市、自治区、军区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大协作会议,讨论确定了防治疟疾的三年研究规划。为保密起见,以会议日期为代称为“五二三任务”。因此,很多人认为,“五二三任务”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,有重要的军事目的。

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,几乎一夜之间,“五二三任务”这个名词也迅速进入公众的视野。很多人把“五二三”与青蒿素的研究画上等号。其实,“五二三任务”作为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,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,不单单只有青蒿素研究。而且,这一科研工程的开展涉及全国诸多省市中的各行各业,上海在其中也发挥了很多作用。



■ 各省市编印的有关青蒿素等抗疟中草药的研究资料

当年“五二三”的很多文件上,有着诸多此类表述。比如当年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的一份文件中写道:“遵照毛主席‘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’的伟大战略方针,为了有效地解决东南亚地区恶性疟疾多,发病率高,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问题……成立了抗疟研究协作领导小组。”

通过对当年国内疟疾防控资料的研究,我们会发现,“五二三任务”绝非只是为了“抗美援朝”。1950年代,国家出台《少数民族地区疟疾防治工作方案》和《疟疾防治规划》等多份规划方案,组织卫生工作队、防疫队、医疗队进入高疟区,抢救疟疾患者,进行预防工作;设立疟疾防治所,进行疟疾防治科研和培训技术骨干等工作;同时举办疟疾训练班,培养专业技术队伍。一系列工作之下,我国的疟疾防控工作开始得到了系统的管理,疟疾发

病率一度由1955年102.8/万下降到1958年的21.6/万。

但是,由于政治、经济以及自然因素的关系,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初我国又出现大范围疟疾爆发,全国发病人数多达1000至2000万,1960年和1970年全国平均发病率分别高达155.4/万和296.1/万,其中197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疟疾发病率最高的一年。1964年,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负责人时,越方提出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。当时毛泽东说:“解决你们的问题,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”。现在看来,这句话含义深刻。在那个时期,疟疾问题已属于“内忧外患”,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。

抗疟工作中的“海派力量”

上海地区并非高疟区,不过从近代起上

海地区的科研院所疟疾防控方面一直有着深入的研究。同时,由于在经济、管理、科技等方面的综合优势,从“五二三任务”一开始,上海就成为该研究工程体系内的主要力量之一。1967年全国“五二三”领导小组成立之后,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,组织了七百余人的抗疟协作队伍,其中有很多人来自上海地区的单位。1968年4月,“五二三”上海地区领导小组成立。

1969年3月,全国“五二三”座谈会会议秘书组印发了《抗疟研究协作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》。这份通知中,明确了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上海、南京、北京等6个地区“五二三”协作组的任务分工。其中,上海地区的任务分工有5条(其他地区多为三四条),任务是最多的:“1.新机构类型防治药物和长效防治药物的研究;2.合成药和中药抗疟药的临床验证、化学、药理、剂型、设备的研究;3.合成(按蚊)趋避剂和中药趋避剂的化学、效价、毒性、制备的研究;4.药物制剂包装的研究;5.抗疟针灸等疗法的研究。”同时,在4个主要专业口(抗疟药的研制和试用、中药抗疟药的调查验证和实验、抗疟针灸等疗法、趋避剂的研究),分别指定了少数的负责单位。而这4个专业口的负责单位中,均有上海地区的单位。

1971年,无论对于中央还是地方来说,都是“五二三”研究部署的重要年份。这年3月,“五二三”上海地区领导小组进行重组,组员单位变为8个:市革委会科技组、警备区后勤部卫生处、第七军医大学(后改称“第二军医大学”)、卫生局、化工局、医药工业公司、医科院、寄研所。4月,上海选派36名科研和医务人员进驻海南、云南、浙江的高疟区进行现场研究。(明日请读B5版)

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

高建国



到隐蔽处。刘飞问:“我们的部队打上去没有?”何彭福说:“部队已经占领了山头,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。”刘飞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叶飞得知刘飞负伤,火速派“江抗”5路政治处主任张志强把刘飞送往阳澄湖后方医院。张志强原名郑潮涌,化名“老牛”。当时,从江阴、苏州到常熟须乘船走水路。“老牛”找来一条八九成新的木船,放好褥垫,安置刘飞躺下,然后和警卫员何彭福一起,从水上把刘飞送到苏州太平桥伤员转运站。一些人得知子弹是从刘飞胸部左乳头边上打进去的,都感到凶多吉少,认为刘飞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。“江抗”指挥部甚至通知部队准备为刘飞开追悼会。但刘飞在伤员转运站经女护理员包蕴打止痛针和清理淤血后,奇迹般地活了下来,换乘小船被转送到阳澄湖上的后方医院。

“江抗”东进5个多月后,10月初,鉴于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军施压并频频挑起战端,为团结抗日,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,以新四军东进部队为主体的“江南抗日义勇军”主动西撤,向苏北发展。

1939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,叶飞率“江抗”转移到武进以西开辟新战场,在东路雾霭笼罩的阳澄湖畔留下了40余名伤病员和10多名医护人员。

阳澄湖地处江苏省吴县、常熟、昆山三县交界处,湖面纵横数十里,素称鱼米之乡,是宁沪杭一带久负盛名的阳澄大蟹产地。后方医院所在的横泾镇有800多年历史,有建于明末清初的著名人文景观毛晋汲古阁,向东与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唐市连接,堪称姊妹镇。散落在两镇周围的是弯弯曲曲的河道,有许多泾、浜,还有难以计数的荡。村庄大都随河道命名。

叶飞率“江抗”东进时,曾用汽艇拖着上百只木帆船,浩浩荡荡进军阳澄湖,横扫敌伪,大长人民志气。

无锡抗联会根据中共无锡县委的指示,把分散在锡东、锡北等地一批行动不便的重伤员,安全集中到茅塘桥、厚桥,再用船送到常熟东乡、横泾地区。中共常熟县委把他们连同原来分散隐蔽在芦荡、芦荡的伤病员集中起来,安置在阳澄湖畔一个港汊的芦苇丛中。

13.市政衙署的建制

地处江南的上海,夏商周至春秋战国,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显然落后于中原,典籍记载更是少之又少,可以说,直至秦汉,有关上海地区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才陆续出现,然而其中涉及酒事者则显得微乎其微。两晋时,陆机、陆云兄弟,堪称“善饮之人”,特别是陆机,少有奇才,文章冠世,被称作太康之英,他写过一首《饮酒乐》的诗:“饮酒须欢多,人生能几何。百年须受乐,莫厌管弦歌。”诗中透出一股豪气,“饮酒须欢多”,没有一定的酒量,岂敢出此豪言,可见,他的酒量一定不小。

晋室南渡后,吴郡太守袁山松也是一个“善饮之人”。据说袁山松擅长音乐,“北人旧歌有《行路难》曲,辞颇疏荡,山松好之,乃为文其章句,婉其节制。每因酒酣,从而歌之,听者莫不流泪。唱和着古音乐的节拍,品着美酒,放声高歌。袁山松于军事不很在行,终于死于兵祸,然而作为饮者,肯定是个行家里手。

史书和出土文物表明,自中国有历史以来,祭祀、会盟、各种庆典用酒都形成了固定程式的礼仪,使用酒器、酒具也逐渐系统、规范起来。酒器、酒具上的图案、花纹、篆刻也与时俱进地形成特色。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转折时期,随之而来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社会的平民化,民众的饮酒习俗已经十分普遍与完备,酒被称为“百礼之首”,可见酒在当时的作用和地位。朝廷能够在这滨江临海的上海浦设置酒务,不可忽视的是,《宋会要辑稿》所记秀州“十七务”,其中“青龙、华亭、大盈、上海、赵屯、泖口诸务”,都位于今日上海境内,可见那时上海地区酒风之盛。上海的成名,难道与“酒”没有关系吗?

关于上海的市政衙署的建制,在历史上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,春秋属吴,战国先后属越、楚,秦汉以后分属海盐、由拳、娄县诸县。公元前223年,秦灭楚后设会稽郡,治所在苏州。会稽郡辖钱唐、由拳县和海盐县。钱唐包括今嘉定、上海两县及青浦、松江两县大部 and 市区部分地区。嘉定县境内还有一个

以瞿命名的瞿城乡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修筑了一条由咸阳经湖北、湖南而抵江苏、上海一带的宽阔驰道。据史载,驰道宽五十步,每隔三丈植树一株。驰道通过今松江西北,“经青浦古塘桥,西通吴城”。公元前210年,秦始皇率丞相李斯、少子胡亥等一批文臣武将南下巡游,曾通过松江西境和青浦南境的横山、小昆山、三泖地带,看到当地物产丰富,人群熙攘,人们划船在水上交游,显然那时的上海还没有形成城市。

公元前207年的汉代,瞿县改为娄县。今金山县境内的海盐县,汉时为刘濞的封国,此地煮海水以制盐。和海盐县发展同时,由拳县也在发展之中。由于局部地体下沉现象存在,海盐部分沦为拓湖,由拳也陷入了谷水。汉平帝元始二年(2年)前后海盐县被迫向南迁移。

晋代上海地区主要依靠渔、盐之利,经济已相当发展。南朝梁大同元年(585年),分割原海盐县地域置青浦县和前京县。唐天宝十载(751年),吴郡太守秦准设立华亭县,上海地区始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。华亭县辖境约今上海地区吴淞江故道以南,川沙—惠南一大团一线以西地区。关于“华亭”名称由来,见于《三国志·吴志》: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十一月,吴孙权封右都督陆逊为华亭侯。华亭是当时由拳县东境一个亭,故址在今松江区境内。唐乾元二年(759年),改吴郡为苏州,隶浙江西道。

北宋时期,上海大陆地区分属华亭县和昆山县,崇明地区属海门县。宋初,华亭县改属两浙路秀州(州治在今嘉兴)。这时华亭县以东的海滩,已经成为重要盐场和渔场,“人烟浩穰,海舶辐辏”,商业日益发达。后因吴淞江下游的淤浅,曾经繁华一时的青龙镇,就逐渐丧失了作为长江口良港的地位,而日趋萧条冷落。与此同时,吴淞江支流上海浦西岸开始出现的聚落日渐兴旺,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(1008年)前后,朝廷在两浙路秀州设立十七个酒务,“上海务”是其中最具有经济活力的一个“酒务”。

醉上海

仲富兰

